

尼采的科学价值审度与进步主义的概念重构

刘佳男, 朱尚品

(长沙理工大学 哲学系, 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科学自身能否生成一种对人性负责的价值维度,是当代科学文化研究面临的根本疑难。尼采曾深入剖析科学蕴含的内在价值,批判其中进步主义观念所预设的功利维度。为了重新使科学服务于有意义的人类生活,尼采试图将科学价值奠基独特个体的创造意志,但这种诗化科学的做法只将世界诠释为混沌的生成性。进步主义观念因而重构为对人性本身的塑造,并演化为道德进步主义与内在德性回归两种取向,但二者都只试图在历史情境中建构人对价值的判断能力,最终难以避免地沦为历史主义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尼采;科学价值;进步主义;麦克道威尔;威廉斯

[中图分类号]B561.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2)01-0047-07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2.01.007

Examination on Nietzsche's Science Value and the Conceptual Reconstruction of Progressivism

Liu Jianan, Zhu Shangpi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Abstract: Whether science itself can generate a value dimension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humanity is a fundamental dilemma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scientific culture. Nietzsche analyzed in depth the intrinsic value of science and criticized the utilitarian dimension presupposed by progressivism. To restore science to the service of meaningful human life, Nietzsche sought to lay the foundation of science value on the creative will of unique individuals, but this poetic science approach only interprets the world as the generation of chaos. The concept of progressivism is thus reconstructed as the shaping of humanity itself, and evolved into two orientations: moral progressivism and the return to inner virtue. But both of them only attempt to construct the human ability of value judgment in historical contexts, which inevitably end up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historicism.

Key words: Nietzsche; science value; progressivism; McDowell; Williams

科技与德性的关系问题几乎和哲学本身一样古老,该问题涉及在何种社会才能实现人的美好生活这一哲学的根本主题。科学曾将自身显示为一种独特的理智诚实,以期无偏见地理

解作为整全的自然。但伴随科学与社会一体化进程的持续深化,科学在近代重新以创造力和精确性的特殊结合作为自身的着力点,将“发现真理”的程序化技艺(*techne*)视作目的(*telos*)

收稿日期:2021-11-27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YBQ003);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18B156)

作者简介:刘佳男(1989—),男,讲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科学文化、技术文化等研究;

朱尚品(1998—),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文化、技术文化。

本身。现代计划的整体方案首次将人领会为凭借激情而追求欲望满足的动物,其所带来的疑难则是,在赋予人类空前力量的同时,科学却无法提供有关运用力量的任何指导,致使科学技术产物愈发在当代社会与人性本身孕生出种种“激进”与“保守”的背离^[1]。本文试图关注的理论问题在于:科学在其现代进程中是否或如何发挥对人性负责的理性能力。从这一角度上讲,为科学事业辩护的可能性有赖于深入理解并重述科学的价值维度。在这方面,尼采(Nietzsche F W)是最早、也是最彻底的以价值论看待科学的哲学家,其对现代科学的价值审度构成了研判科学人性底蕴的重要资源。

一、科学价值的尼采式审度——进步主义的首次揭示

现代思想典型地将科学诠释为征服自然的一种系统计划,这尤其体现在早期现代哲学家将科学打造成借助因果推理控制物体,并通过普遍数学丈量广延的工具等方面。作为深研古典学问的现代人,尼采在其主要著作中将科学自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变化拟喻为从“主人价值”到“奴隶价值”的转换^[2]。古典科学由于呈现为一种对既定习俗和意见的拒斥,因而是对未知自然和不确定性真理的勇敢探索,但现代科学却深深扎根于人类恐惧的基本情感,因而将不确定性视为必须被克制的例外因素。这种专注于稳定、控制和操纵的科学从根本上派生于现代价值观,即试图在全面支配自然的同时缔造一种消除人类等级差异的社会前景。

尼采的上述洞见指明了价值论在科学发展中的决定性地位:科学的萌发与嬗变皆受到价值驱动的深刻影响。正如后继的思想史家雅各布·克莱因(Jacob Klein)等人所强调的,隐藏在现代科学“普遍方法”背后的实际是一种亟待澄清与辨明的人本主义价值观^[3]。这类观念建立在对自然实在性的某种深刻怀疑的基础上,因此试图通过将外部世界整体数理化进而解放

人类激情的力量。而在尼采看来,这种解放也为科学和社会发展的走向提供了根本性选择。本质的分歧在于科学事业中的人类地位问题:以一种纯然服务于人之意图的科学,将自然塑造成完全被掌控的客体,从而促进人类整体的舒适生存,这一规划是否在道德上真正可取?通过阐明现代科学预设的道德目标,尼采充分揭示了科学在现代所确定的进步主义观念。这类观念最终强调科学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整体提供一个清晰明确的未来,其中所有个体都被科学启蒙从而理性地追求其个人私利。

在尼采看来,这种进步主义观念实际上是以利己主义(self-interested)作为基础,因而只是一种对自然人(homo natura)天性的刻板解释。这种解释必须通过将世界化约为物理学意义上的对象才是可能的。原因不仅在于物理学试图将世界还原为直接确定性的客体以此慑服自然,更在于其通过诉诸感觉经验的普遍适用性继而整体地属于大众^[4]。朗佩特(Laurence Lampert)认为,自培根及其更精致的笛卡儿主义开始,科学价值的进步趋向就通过将自然假定为纯然因果的机械之流,从而捍卫了以物理学为范式的理论确定性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大众利益^[5]。尼采强调正是在科学时代,被启蒙的大众以其“理智诚实”将宗教信仰世俗化(secularization)为进步信念。但诸如谦卑与怜悯等基督道德已不再保有值得为其献身的超验基础,物理学对世界的统揽因而只揭示了人自身在精神上的极端无所凭依。人对科学进步的驱动最终只是期待技术文明能够带来生理水准的人类满足,即生产与消遣的低劣循环。

潘戈(Thomas L. Pangle)将尼采所意识到的问题总结为:面对注定以“大众化人类”为中心的科学时代,我们是否还拥有在精神上自我提升的可能^[6]?进步主义观念致力于科学服务公众利益的普遍理想,将人与世界同时化约为“专注自我保存的动物”和“本质确定的存在者”。科学的人本价值只体现为利用自然质料

服务于全体人类舒适生存的宏旨。然而在尼采看来,此类科学正是为了促成人的精神矮化和放纵,将自然完全褫夺为一种“无目标的挥霍和无尺度的冷漠”。对尼采来说,科学人本价值的真正意涵绝非泛滥的庸俗主义和人类肤浅的自鸣得意,而是在于使人能够直面自然,通过超越自我而臻于完美。毁弃自然的充盈性与高贵性将导致虚无主义或末人的统治。对任何真正属于人的伟大尊严而言,科学价值的人本维度必须以自然本身作为根本依据。

尼采试图辩护的是,美好社会无法充分建立在现代物理学及其衍生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上,而只能通过复归自然(*vernünftlichen*)来寻获支持。物理学的世界观不仅无法涵盖人类意志的丰富取向,而且尤其难以支撑人类精神自我超越的渴望。因此,必须恢复古典意义上自然“为人类提供标准”的道德地位,人必须通过重新上升到崇高的自然性(*naturalness*)来克服单纯计算后果的功利主义理智。尼采正是为了该目的,将“万物的生成性”这个在他看来唯一清白的(*genuine*)自然最高准则,理解为治愈理性时代价值虚无的根本手段。但能够接纳这一自然本性的并非柏拉图意义上的纯粹心智(*pure mind*),而是更为原初和复杂的人类本能。进步主义观念所依据的自然人的舒适生存,只是基本的权力意志的片面体现。尼采因此试图构建一种全然根植于“自己”(*the self*),根植于“自己”的身体与意志,对万物实行创造性重释的科学事业。由于科学作为对真理的自由阐述乃是一种视角主义的价值创造,因此,个体正是通过其权力意志的创造行为,在延展生命深度的同时重新回归真实的自然流变。

然而,正如罗森(Stanley Rosen)的研究显示,尼采的科学本我论(*egoism of science*)所面临的困境充分体现在其哲学立场造成的激进后果^[7]。这种对科学的诗性改造要求将自然重新诠释为一种兼具生成与循环,在整体上具有神秘性质的存在。为了再次寻回哲学生活作为人

类等级的顶峰这一古典传统,尼采试图综合自然与历史的做法,从根本上消减了哲学对独立于意志之真理的热爱,并将科学对事物或许是什么的解释性规定混同于事物本身。自然不再体现为柏拉图意义上象征纯粹心智的善好具象,而只是由超人的创造行为所掩盖的混沌与幻象(*schein*)。尼采的“自然”从根本上无法容纳他对精神之高贵与低劣的等级区分,这种“创造意志”与“自然生成”相互印证的一元论,最终只是将科学自身揭示为对“可能性”的残酷信仰。

二、科学价值进步主义观念的当代重构

进步主义预设的观念认为,通过科学自身的持续发展,能够一劳永逸地改善人类全体的生存境况。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科学确立了提升人的力量进而征服自然的现实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哲学的视野被窄化到那些完全具有确定性的因果机制领域,逼迫自然显露出可被驾驭的稳定规则。尼采所要揭示的是,伴随科学对自然的掌控向理论复杂化和实践规模化的不断精进,科学愈发遗忘了“人应当追求何种生活”这一苏格拉底问题。为了阻止人性向庸俗的享乐主义不断下滑,尼采试图通过讴歌价值多元的创造意志,使科学回归作为生成与流变的高贵(*vornehm*)自然。然而正如维克利(Richard Velkley)所阐述的那样,通过表明科学真理也不过是一种主观价值,而价值不过是无法证实的属人视角,尼采因此彻底揭示了科学时代人性的无根基处境^[8]。正是尼采的价值创造论及其关于自然生成的教诲,将人与世界共同诠释为一种缺乏本性的历史化存在(*historicized existence*),最终导致科学对多元价值的理性判断不再具有非历史的标准。

扎科特(Catherine Zuckert)试图表明,现代科学在价值内蕴方面的匮乏直接导致了当下对所谓科学泛民主化的政治偏好^[9]。由于价值判断不再被认定具有客观理由,多元价值的彼此冲突就会被交由更广泛的多数人进行集体决

断。这一结果实际上促使科学价值的进步观念与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的政治理想紧密结合,二者相互强化造成“开放式的公众科学”被确认为当代不可阻挡的未来浪潮。但“人性的价值评判”这一科学事业的绝对前提,并不会由于遭到无视就失去自身的根本影响,科学的发展方向仍然依附于“前科学”的价值判断和伦理准则。除非我们能够认定人类道德本身就处于一种持续进步的历史过程当中,否则我们就无法接受科学所许诺的这一公众化的未来前景。

从这一角度上讲,进步主义的理念重构就必然从关注科学的自主发展转向强调人性在道德上的成熟过程。普特南(Hilary Putnam)和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等人都以各自的方式,论述了道德进步主义对科学事业的决定性意义。尽管普特南以“科学实在论”作为其最初的哲学诉求,但在强调伦理学比科学事实更重要的意义上,普特南默默追随了康德。其区别在于,普特南吸收了尼采关于科学依赖人性视角的本我论教诲,但却拒绝了尼采关于人类历史只是变动不居的无序创造这样的观点。其结果是,普特南达到了某种后黑格尔式的哲学立场:不再承认科学具有自我完成的绝对时刻,而只专注于阐述人类道德持续“理性化”的历史机制。因此,普特南一方面将科学的实质理解为由社会繁荣带来的劳动分工及其不断细化;另一方面,社会主体在这一过程中依靠具象的思维方法,即反思性的超越(reflective transcendence)进而增强其在价值判断上的理智明晰性^[10]。

尽管普特南明确要求将道德进步的动力根植于情景化的反思当中,但在麦克道威尔看来,问题实则在于要为道德完善的可能性提供一种源于自然本身的支持。如果我们对道德的自我理解确实处于一种教化(bildung)的理智进程,这一进程就必须建立在理性与自然相互敞开的基础之上。麦克道威尔认为,一方面伦理培育必须以理智自由作为根本前提,强调理智自发

性具有独立的理由逻辑空间;另一方面道德必须体现为实际的责任和义务,以避免将其诠释为完全脱离现实的“膨胀柏拉图主义”(rampant Platonism)^[11]。麦克道威尔的解决方案在于构建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强调人对伦理生活的沉思不仅是一种自主的知性建构,同时还是一种源于自然的成熟过程。人的自我教化因而既向理由的逻辑空间敞开,其被理性塑造的方式又是完全自然的。

简而言之,麦克道威尔试图重新丰富已经被现代科学所祛魅的自然概念,同时又试图避免自然的神秘主义返魅。其结果是,作为容纳人类道德及其实践而出现的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体现了道德进步如何既是自发的理智行为,同时又是自然本身的一部分。人的道德完善因而构成了一种“自然的历史进程”,在主体全面获得实践智慧时达至顶峰。麦克道威尔以自身的方式续接了尼采的主题:如何在赋予人性意义的同时,调和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分裂。麦克道威尔拒斥了尼采关于创造性本身就是意义的主张,强调在自发性之上还存在着道德的教化过程。但本文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麦克道威尔与普特南一样,都没有为人性何以能够选择进步作出说明,也未能描述这种进步在道德样态上的现实特征及其自然依据,因此都难以回应尼采的根本质疑:沦为“纯粹外部世界”的客体自然何以能够提供道德的理智标准?

普特南与麦克道威尔针对科学与道德关系进行的一系列建设性反思,充分揭示了科学展开其理智活动的道德前提。为了保证并促进科学的向善发展,就必须将人对“前科学”的价值判断理解为处于持续进步的理性进程,以使科学能够向人的道德敞开,为人的伦理诉求负责。但普特南和麦克道威尔都坚持从一种已然被现代观念支配的“历史主体”和“外部世界”出发诠释进步的可能性,同时都拒斥回归古典意义上容纳人类道德独特性的秩序论自然。其结果是,虽然人的道德自我教化被理解为科学良性

发展的观念前提,但这种道德的成熟过程依然缺乏切实的自然基础。它要么依赖人天生具有道德潜能的理论假设,要么必须将道德进步的可能转化为新的信仰^[12]。

三、超越科学价值进步主义观念的可能性

自近代以来,科学确立的进步主义观念笃信科学有能力并且有义务解决人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为了促成这一进步信条得以实现,最早由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首先确认了人的根本问题只是对“免于恐惧之自我保存”的需要;笛卡儿继而发展了促进人类自我保存的科学方法,即建立在观念自明性和客体稳定性基础上的普遍数学;最后由洛克和卢梭共同推进了科学的公益责任,要求将人引向一种全面启蒙的现代社会,其中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合理追求舒适生活的个人权利。这一进步过程不仅全面催生了我们当下所处的科学时代,而且尤其历史性地构建了科学自身的范式:传统依赖意见的沉思被转换为自发性思维的重构式怀疑,科学因而被整体塑造为基于实践的技术模式。进步主义观念认定科学的无限发展能够首先通过摆脱自然限制的方式,进而消除人在生理和精神上的双重亏欠与不满,最终达到人类心智的全面自主与自觉。但尼采所强调的是,除非我们能够首先理解究竟什么才是人性丰满的真正标准,否则就难以区分自由与堕落在人类处境上的差异。

为了实现科学服务公众利益的整体宏旨,进步主义观念必须要求科学只专注于对事实性规律的因果预测,以增强科学利用外部世界满足人类生理机能的属性。这进一步造成了科学价值的失落危机:科学已不再能保有一种理性视角以审视其对理智力量的运用,从而沦为单纯创造物质财富以服务人类舒适生存的理智工具。尼采因而着重批判了进步主义观念在塑造科学价值上的不良后果:由于只专注于生产无意义的事实真理,科学不能澄清诸价值依据自

然的内在层级,最终导致最堕落的人(the last man)与庸俗大众文化的全面崛起。对进步主义来说,为了重建科学向善的可能性,就必须将科学事业的根本前提,即人对道德的价值判断理解为处于不断完善的历史进程。但包括普特南和麦克道威尔等人诠释的道德进步主义都无法解决道德的自然根基问题,因而只将自身揭示为一种历史主义的假设。

当代的科学价值反思总体呈现为一种超越进步主义观念的尝试,并试图重新确认人性在道德伦理上的独特地位。其中,最典型的进路以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的“内在德性回归”作为主要代表。威廉斯最先揭示了现代道德哲学在回应人的伦理关切时的不充分性:无论契约主义(contractualism)还是功用主义(utilitarianism)都建立在主体自愿承担的道德义务上,而完全忽略真正的伦理问题乃是人应当如何生活的恒常慎思。这种只注重人在公共社会下的行为义务,并以此构建普遍性理论的伦理学偏好,无疑是由科学进步导致的理性主义泛化的结果。威廉斯认为,必须借助古典德性观念才能重新刻画现实生活中反思与实践的张力。为此,威廉斯重新界定了“伦理德性”与“道德义务”的不同内涵,并有意识地回归亚里士多德意义上追求正当生活的伦理取向^[13],要求将一种对人格品德的自我省察,即对真理和诚实的信任贯穿于由自我与社会共同呈现的日常体验当中。

威廉斯批判的要义在于,科学的进步催动了“理性的管制”被不加反思地应用于人类道德这一独特建制中。其结果是,现代伦理学为种种系统性的道德义务理论赋予了未经审查的权威,在远离生活的同时被理性共同体的梦想所支配。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概念因而只是对更广泛的伦理诉求的特殊考量。威廉斯试图回归的“伦理德性”观念强调,公正生活有赖于使个体持续经受慎思的自我理解,而非将理性贯穿于还原式的道德理论。但是,威廉斯的回归取

向同样拒斥亚里士多德“人依据自然而追求美德”的伦理假设。在威廉斯看来,这一假设由于认定自然物具有内在趋向完善的目的论意图,因而是对伦理慎思的潜在基础——康德式意识自由的压制。

对尼采而言,传统道德基础的破灭为促进“科学解放人性”提供了根本契机,但以物理学为范式的现代科学却在这一契机面前遗忘了“人应当追求何种生活”这一苏格拉底问题。在这一点上,威廉斯保持了与尼采完全一致的哲学眼光。但在同样接受古典自然目的论消亡的同时,威廉斯却在两方面区别于尼采的立场:第一,试图重新在传统伦理观念中寻找指导现代生活的思想资源;第二,试图在后现代智识环境中捍卫启蒙科学的理想信念。两相综合的结果是,威廉斯一方面要求从理论化的科学世界返回日常伦理生活的现实关切;另一方面又试图维护科学知识所具有的普遍有效地位。通过强调对启蒙的信任,威廉斯要求促进个体对伦理德性不加偏见的自我理解。客观共识性德性的产生因而就在于:个体以其真诚态度持续追问自身对厚实(thick)伦理概念的自我理解是否能够经受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审查^[14]。

然而,拒绝回归古典目的论的自然观,并坚持将伦理考量理解为个人在社会中的自发反思,揭示了威廉斯“内在德性回归”同样具有的历史主义基调。尽管威廉斯批判了康德在构建其道德法则的过程中,过分依赖于对普遍原则的敬重;但其本人对德性知识的重塑仍然奠基于康德伦理学的自由主体之上。其结果是,普遍道德律被既存社会中个体生活的伦理慎思所取代。威廉斯因而仍需提供一种说明,以阐释历史主体的自我反思如何能够区别于个体自发的盲目假定。由于拒绝重释自然本身的道德意蕴,威廉斯的德性回归取向摇摆于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之间:除非重新认定主体的伦理慎思具有一种“自我满足”和“自我规定”的历史进程,否则我们就难以期待这种回归能够为科学

进步提供足以信赖的道德前景^[15]。

四、结语:科学价值与进步主义的内在张力

通过增进个体对外部环境的利用和改造,科学起初提升了人类相对于自然的实力地位。然而自尼采以降,这一现代性规划逐渐被揭露为一种对人性日益堕落的放任。要求科学改善人类整体处境的进步主义理想,必须将准确预测外部世界的运作规律视为科学的根本任务,以满足人类整体作为有机体的舒适生存。以经典实证主义的论述而言,正是在这一时代,科学放弃了询问事物本性和起源这一根本问题,并安于构建事物之间因果关联的方式。这一转变直接导致科学认定对于何为善恶并不能形成统一的理性认识,进而直接催生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fact/value dichotomy)。该教条的本质实则是强调:如果针对何种价值更为可取,理性并不能提供有根据的缘由,那么一切价值就必须被理解为绝对平等。这一观念致使最低的价值和最堕落之人全面占据优势,所谓科学进步的“自主发展”将深度依赖现实的社会权力和既定文化。科学必须注重对道德维度和人性温度的关怀和建设,以避免科学沦为人类无序历史建构的附庸,从而造成突出的人本主义失控的危机。

由于认定科学的“时代天职”只在于阐释某种价值观可能导致的后果,这一观念反过来在理论层面强化了现代科学的虚无主义本质——要求从根本上将价值平等和普遍宽容确立为科学的理性命令。内格尔(Ernst Nagel)据此区分了价值的评价性(evaluative)判断与表征性(representational)判断,强调科学理性就是对系统说明和证据事实的探求,因此必须维持价值中立的立场^[16]。但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反过来深化了这一区分的哲学意义,认为这种区分实际是勒令科学只能专注于价值的效用领域,从而禁止科学对人类真实的道德处境给予任何严肃考量^[17]。因此,重新在科学中

弘扬进步精神的可能性有赖于意识到人性的真正尊严乃在于其自然完善。无论道德进步主义还是内在德性回归皆在于恢复理性辨识诸价值内在层级的能力,然而这两种取向都拒绝以自然本身作为人类品性的真正参照,最终全部诉诸种种自主做出选择的道德人格。但在尼采看来,对现代虚无主义的克服必须重新唤醒已被遗忘的自然,并将自然理解为人应当如何生活的根本基础。从这一点来讲,当代科学文化研究必须使自然从专注于增强人类自身力量的长久叙事中解放出来,继而真正重建科学与人文的深层沟通^[18]。

[参考文献]

- [1] 易显飞,刘壮.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理论主张及论争启示[J].世界哲学,2020(1):151-159.
- [2] [德]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黄明嘉,姜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86-487.
- [3] [美]雅各布·克莱因.雅各布·克莱因思想史文集[M].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58.
- [4] [德]尼采.善恶的彼岸[M].魏育青,黄一蕾,姚轶励,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3-24.
- [5] Lampert L. Nietzsche and Modern Times: A Study of Bacon, Descartes, and Nietzsch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300.
- [6] Pangle T L. Leo Strauss: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Legacy[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12.
- [7] Rosen S. The Mask of Enlightenment: Nietzsche's Zarathustra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1-22.
- [8] [美]施特劳斯,讲疏.维克利,整理.尼采的沉重之思[M].马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8.
- [9] [美]施特劳斯,讲疏.维克利,整理.古典政治哲学引论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讲疏 1965年[M].姜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9.
- [10] Putnam H. Ethics Without Ontology[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86.
- [11] [美]约翰·麦克道威尔.心灵与世界 新译本[M].韩林合,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07.
- [12] 刘佳男.普特南的实在论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20:170-173.
- [13] Williams B.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6-7.
- [14] [英]伯纳德·威廉斯.真理与真诚 谱系论[M].徐向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4-16.
- [15] [美]罗伯特·皮平.黑格尔的观念论——自意识的满足[M].陈虎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0-12.
- [16] Nagel E. Sovereign Reason and Other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M]. Chicago: Free Press, 1954: 28-29.
- [17] Behnegar N. Leo Strauss's Confrontation with Max Weber: A Search for a Genuine Social Science[J]. Review of Politics, 1997, 59(1): 97-125.
- [18] 孟建伟.科学与人文新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59-62.